

【实录】

从仨观众的曲艺厅到万人体育馆

□刘延广 口述

【味道】

卖冰糕

□胡安仁

50多年前,济南没什么冷食可买。夏日到来,居民消夏避暑的冷食,除了“拔凉解渴的冻冻”(大都取自大明湖畔的冰窖),仅有的就是冰棍。

那时,济南生产冰棍的厂家并不多,除了较有名气的“恒泰冰棍”(大观园南门路北)、“天成冰棍”(普利街内)外,在十一马路、北小门、东门里、北坦一带也有一些小规模冰棍生产厂。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设备都很落后,冰棍制成后,先用印有商标的白纸包装好,然后再放入一个个白铁皮做的铁套内,接着再将其置于撒着盐(延缓冰块的融化)的天然碎冰块上冷藏以待销售。由于那时的制冰技术落后,在生成冰棍时,会发出一种呛人的异味,十分刺鼻。

冰棍分长方形和多棱形两种,主要成分是糖精、白开水。有些厂家为增加冰棍的“粘度”,还别有用心地掺进面食汤。卖冰棍者大都是平民百姓,货批发到手后,小贩们便忙不迭地将冰棍紧紧地排放在有棉被和小竹帘的木箱里,然后再将竹帘和棉被裹严,便争分夺秒地背上肩,走街串巷不停地吆喝着“冰棍,谁买新冰棍”。如今,那悠悠的叫卖声早已消失,但作为一种音符,却真实记录下了老济南特有的市井风情。冰棍批发每支1分4厘,零售每支2分,利润仅为六厘。

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冰糕应运而生。冰糕的个头较冰棍稍大,原料由红白糖取代了糖精,零售价为3分或5分,小贩们肩背的冰糕箱,大都被一种能盛25支、带有瓶胆的手提保温筒取而代之。

1958年前后,因家庭生活困难,我也曾有过一段卖冰糕的经历。在卖冰糕的“初级阶段”,老城区是我涉足的范围。后来,济南肉联厂生产冰糕,并对外批发。我便“鸟枪换炮”,改手提式冰糕筒为能盛五百支冰糕的大木箱,骑着“大国防”(青岛金鹿牌大飞轮自行车的前身)远离市区贩卖。夏日一大早在肉联厂冷库装上冰糕,一路东行,到东郊大辛庄、韩仓、滩头、坝子等集市叫卖,最远到过郭店一带。我记忆最深的是到“374”(济钢初建时一处工地)卖冰糕。那时天热,只要将车子一停,随着“冰糕,新冰糕”的吆喝,该工地宿舍区的工人便争先恐后地出来一抢而光。三伏天销得快,一天从肉联厂往返两趟是常有的事。1960年,我在小学任职后,利用暑假照卖不误。为此,在1962年社教运动中,我还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。只是因了年轻没怎么计较罢了。那段卖冰糕的经历虽不长,但对我生活的磨炼却是千金难买的。

如今,年轻人早已不知冰棍为何物,冰糕也早已被各色蛋、奶、巧克力雪糕和甜筒、冰激凌所取代,卖冷食的贮藏工具也皆为现代冰柜。然而,记录那段历史的“冰糕”“冰棍”的叫卖声,老济南记忆犹新。

我小时候,济南的书场特别火爆。解放以后,省、市都有曲艺团,区里也有曲艺队,除去这些,街头还有许多流浪艺人撂地演出,盛况空前。在青龙桥、老东门、八一礼堂、南门等市场都有书场,但依然容纳不了几百个说书人,艺人们便走街串巷,在济南大街小巷,到处能听见鼓声、弦子声。

我打小就跟着爷爷钻书场,听了故事就回学校讲给小伙伴听。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就成了学校小名人。一打下课铃,同学们“呼”地都跑到我班里来,围着我听岳飞、秦琼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。有时候上课铃打了,大伙儿也不愿离去,老师想上课都进不来。

年少时我一心想上大学,但家里生活困难。作为老大,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,我初中毕业后便没再考学,选择了下海说书。最初我在海晏门租了几十条板凳落地演出,一晚上就能挣四到六块钱。这可是大钱,那时一个鸡蛋才两分钱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,“粉丝”们凑了钱帮我在南门盖了一个简易书棚,取名“延广书场”。那时评书颇有市场,演出时书场里不仅凳子上坐满了观众,就连地上也全是人,根本走不动。棚外也围满了观众,甚至比里面还要多。观众为了能听得更清楚,在书棚上抠了许多窟窿眼儿。

后来我去了历下曲艺队,一晃到了六几年,国家开始提倡说新唱新。我初中毕业,有文化能看小说,市里便重点培养我说新书。改革难免伴随阵痛,我原先说旧书时观众满座好几百人,一下子改说新书,让我傻了眼。那时在百货大楼东邻可容纳四百来人的中型曲艺厅里,开着六个电扇,连售票员共十来个人在那里服务。我往台下一看,竟然只来了三个观众。这仨观众都不敢抬头看我,我硬着头皮说了一会儿,有一个观众起身走了,我心里开

始打鼓。这时,又有一个观众起身说:“小刘,别说了。”也转身离开了,原来这俩观众是一块儿的。说场新书,最多能来十来个观众,空园子的尴尬劲儿让我连饭都吃不下去。

我咬着牙坚持说了一年新书,到了1963、1964年左右,旧书一概不允许说了。济南听书的观众多,没有旧书听了,只得听新书。由于我早说了一年新书,积累了不少经验,这时我的观众们都回来了。

相较于旧书中的才子佳人,新书来源于生活,更接地气,要说得逼真、活灵活现,观众才会买账。那时说书竞争太激烈,人家睡觉的时间我都不敢休息,通宵苦心钻研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开始创作演出《燕子李三》。起先我是把现成的一部六万字小说《燕子李三落网记》改编成了评书,随后的几年,通过去各地采访,搜集民间故事,我边说边改,最终形成了近三十万字的评书。

那时公安类型的评书很少,要想说得像,必须得深入实践。李三被抓时是什么情景?我专门请教了刑警队员,刑警抓住犯人,将其摁倒在地的一招一式,我都学了一个遍,回去后在家反复练习,这些动作作用在了演出中很出彩。

在燕子李三的故事中,李三被审了好几次。为了解审判的情景,深入揣摩李三被审时的心情,我和其他两位同事特意联系了刘长山派出所,专门去旁听了一场已经结案的审判。当时,我们三人身着便衣,被审的这名已判死刑的犯人刚被带出来时,看到我们仨人,吓得往后一闪。后来我才得知,原来犯人把我们错认成了法院的人,一般法院来人身着便衣,这意味着很快就要行刑了。这时犯人的内心是很害怕的,这个细节也被我运用到了演出中。

为了广泛搜罗李三的故事、传说,我还特意跑到李三的老家禹城小李庄采访。



▲ 刘延广在中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上演出。



◀ 1967年10月,刘延广在剧场演出。

李三弹跳力特别好,小时候就蹦得高、跳得远,喜欢上墙逮猫。成年后,他的反侦察能力特别强,坐不留根。他坐着时必须面朝门,靠着窗,腿从不放到桌子底下,保证站起来随时就跑。这样生动的细节都是从乡亲们的口中听来的。我还接触过当年缉捕李三的旧警察,他们告诉我,上司让他们逮李三,他们便成天在街上转,其实根本不敢逮,他们最怕碰到李三。为啥?对方式艺太高强了。

广泛汲取着民间的营养,李三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日趋丰满。我在南临沂体育场里说《燕子李三》时,观众达上万人。用乒乓球台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搭个台子,四周围满了观众。

我三十六岁那年,去郑州参加了中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,我的成名就在这里。我一去才发现,侯宝林、马季、常香玉等全国好几百名演员齐聚一堂。头一回见这种世面,人家都是大皮箱小皮箱,而我没住过高级宾馆,那时家里也穷,连毛衣都买不起,外面罩个棉袄,里面就穿了个小褂,提着一个印着“济南泉城”的帆布兜。

小组开会发言时,曲艺同行们听说我在山东能把新书说到体育馆里,很吃惊,让我介绍经验。我说,评书要与时俱进,把大书改成小段,就像单口相声一样。扣子紧,有悬念,包袱多,自然能吸引住观众。

后来我被选上参演这次活动的一台晚会。我哪见过这种场面,以前在剧场说书没有麦克风,就是把收音机里的喇叭抽出来对着嘴,很原始。而这次来了一二十家电视台电视台,好多又大又笨的摄像机,让人看了就害怕。我上场前紧张得一个劲儿出汗,前后跑了十一趟厕所。坐在我旁边的刘兰芳看出我不太对劲,鼓励我说:“延广,沉住气。你说得那么好,害怕什么,没事!”等到喊到我的名字,刘兰芳拍了拍我,我就像踩着棉花套子一样上去了。

“上场如老虎,下场如绵羊”。我当时表演的是自己创作的《虎口夺盐》。作品中汉奸的形象被我表现得鲜活生动,台下掌声不断,我一下有了信心,越说越精彩,“游击队化装的日本人把汉奸抓住,往回一拖,连背心带肉皮都抓住了。”“哗哗哗”又是一阵掌声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,我在新书中融入了很多心血,也经历过评书的辉煌。评书这门艺术,要想说得好,需要很深的文化底蕴,要博古通今,得下一番苦功夫。过去说评书的是一帮文人,而不是艺人,他们一肚子学问,能写历史,讲故事。而如今,能说大书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了,想到这些,我很心焦。希望国家能花大力气,选出好苗子,把这门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(本报记者 范佳 整理)

【厂子记忆】

在洗衣机厂工作的日子

□韦钦国

3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,进入位于王舍人镇的济南洗衣机厂工作。从解放桥坐上那种两节车厢相连的8路公交车去报到,刚上车时心里充满无限期待。车到全福立交桥时,同车的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的新同事,看到仅两层的全福立交桥时,吃惊地问:“这也叫立交桥?”过了黄台电厂,越往东,心里越凉,渐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

公交车在路上晃荡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洗衣机厂。人事科让我们填表时,好像在单位一栏让同时填上小鸭集团和济南洗衣机厂。我当时分不清谁大谁小,就填了“济南洗衣机厂小鸭集团”,工作人员说“填倒了”,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说“就这样吧”。

在厂里第一次吃午饭就把我吓了一跳。食堂在北门西侧,食堂内几个售饭窗口依次排开,但每一排人都很多且非常拥挤。老工人挽着袖子,举着饭票往前挤。我们等了好久才买到菜,味道也一般,比学校饭菜差远了。不过,印象更深的是,公用的碗比较粗糙且多有缺口。

我们那一批进厂的大约150个人,基本都是本科生和专科生,这是厂里第一次进这么多高学历的员工。有一次王世敦厂长(后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)开会时说,厂里对我们这批新员工非常重视,非常关心,非常看好,要好好干,以后厂里发展就看我们了。我们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的自豪感。

我们住在铁骑路南头七层的青年公寓,是厂里专门为大学生准备的。公寓格局为一室一厅,每层16套,客厅、卧室各安排两张上下铺铁床,住8个人,配两张桌子

和8个凳子,比大学宿舍还挤。虽然如此,许多老员工还是很羡慕,说我们住的条件比他们入厂时好多了,赶上了好时候。开始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,不允许私自做饭,后来统一配上了煤气罐和煤气灶。

不要说当时,就算现在周围的环境都说不上好。门口的道路坑坑洼洼,往济钢送煤的拉货的大货车来来往往。东面是济钢,北面是化肥厂和市直三院;公寓对面是轻骑集团第三(或第二)总装厂,南侧是铁厂,污染很重。有一次去楼顶晒被子,发现屋顶上落了一层一厘米厚的黑色粉末,一问才知道是铁厂排出的废屑,被子自然晒不成了。当时进城只能坐非常拥挤的8路公交车或3块钱的小中巴,业余时间多半在宿舍打够级。

在厂里培训了一个月,还没有认全同批的新同事就被分开了。一半留在厂里做技术或管理,一半被分到位于黑虎泉北路的销售公司跑业务。

刚到销售公司的时候,我们有三个月的实习期,每月基本工资400元,奖金400元,出差补助480元,加起来1280元。在那个年代,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。

销售人员平均两三个月回济南一次开会或报销,待上三五天就走,业务都在销售公司办理,很少回厂里。家在济南的直接回家住,外地的就回青年公寓。有一次出差回来,我发现床被人占了,被褥枕头都没了,问谁都说不知道。一年后再回公寓,竟有室友问我“你找谁?”原来,第一批室友外出租房住了,以后随走随进,以至于没有人认得我这个首批入驻的“老员工”了。

1985年,洗衣机厂在国内率先引进了

意大利先进技术,成为中国第一家生产滚筒洗衣机的企业。有几年效益很好,尤其是在上交所上市后更达到顶点,印象中销售公司一个月回款过亿元也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,曾在同一宿舍住的王健祥叨着一根“大鸡”冲我显摆,“这个月光奖金就发了1000块!”当时,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十余辆新班车,走在工业北路上很扎眼,厂门口等着装货的车排着老长的队伍。再后来,又上了雅奥双缸洗衣机厂,销售也不错。那几年,着实过几年好日子,连门口的烟摊,扎啤摊都跟着挣了钱。

后来,为了考研我从外地调回济南,因为没有合适的岗位,被安排回厂里帮忙。车间四五十岁的老大姐们穿着工作服,干累了就偷偷地从车间里溜出来,一边用大搪瓷缸子喝水,一边说“歇一歇!”午休的时候,几位大姐热心地给我介绍对象,说厂里有许多好姑娘,再不下手就晚了,并套用了当时的广告语“一次投资,终身享受”,说完,几个人哈哈大笑,其热情和爽朗令我印象深刻。

古语曰,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没过几年厂里效益下降,被搞金融投资的外地企业给控股了,许多人先后离开,黑虎泉北路的销售公司办公楼也卖了,成了一家民营妇产科医院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自2001年离开后,再也没有回过厂里。

铁厂好像早就停了,济钢也要搬迁了,前段时间路过洗衣机厂门口,周围环境变化很大,我竟然没有认出来。听说,最近几年,经过政府帮助和自救,洗衣机厂效益又开始好转,令人欣慰。

“厂子记忆”投稿邮箱: qjwbhzbz@163.com